

五四时期“社会改造”话语与“主义”的崛起

——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吴汉全

[摘要]五四运动使中国迎来了“社会改造”的时代。在“社会改造”的语境之中，“主义”在高度关注中“崛起”，并成为“社会改造”的根本性问题。于是，时人对于“主义”的认知和解读，皆与“社会改造”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主义”因“社会改造”而崛起，故而“主义”又与从事改造社会的社团发生联系，并成为引领社团前进方向的根本要件。这又导致社团中关于“主义”的论争，继而使社团因“主义”不同而分化。但“主义”一旦进入中国并置身于“社会改造”话语体系之中，也就具有某种相对的独立性，并出现了“主义”的“本土化”趋向，从而最终促进了作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逐步地建立其话语权势。

[关键词]“主义”崛起；社会改造；五四运动；社团；中国现代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9)05-0004-14

“主义”的崛起乃是中国现代思想史考察的重点^①，这自然关涉五四运动。实质上说，五四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思想演变的重要转折点，使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由“个人改造”进至“社会改造”的层面。社会改造自然是变革当下社会的活动，这就需要在一定的“主义”指导下进行，这又引起中国思想界对于“主义”的高度关注，并形成了对于“主义”探讨的热潮。就中国近现代思想演进历程来看，五四时期“主义”的崛起，不仅处于“社会改造”的话语体系之中，而且也是历史逻辑衍化的必然结果。

一、“主义”的认知及其解读

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关于“主义”的认知，是与“五四”所开启的“社会改造”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它使中国迎来了“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时人对于“五四”的认知，大都触及其开启“社会改造”的重大意义。新潮社的主要人物傅斯年在五四运动后曾说：“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雷吓得清醒。……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我们在这个时候，处这个地方，自然造成一种新生命。”^②另一位新潮社的成员罗家伦也认为，这改造运动时代的到来，使中国社会以“五四”为界呈现不同的景象，“五四以前的中国是气息奄奄的静的中国，五四以后的中国是天

^① 既有研究成果所说的“主义”崛起，其所谓“主义”一般指称“马克思主义”，并且沿着“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宣传——三大论战（即问题与主义论战、社会主义论战及无政府主义论战）进行叙述的。本文所说的“主义”不只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主义”；本文以五四时期的社团及其相关期刊为考察对象，并且将这种考察置于五四时期的“社会改造”话语体系之中。特此说明。

^②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97~98页。

机活泼的动的中国”五四运动的“功劳”就在于使中国“动”起来^①。可以说,正是因为“五四”所造成的“社会改造”时代的到来,从而为“主义”的认知和“主义”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关于“主义”的认知和解读,一开始就与“社会改造”紧密联系在一起。李大钊对于“主义”与“社会改造”关系的阐发,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有着代表性。李大钊指出:“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希望。……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②李大钊揭示出“主义”与社会改造的关系,就在于明示“主义”的现实价值。理论上说,所谓的社会改造乃是在“主义”指导下的社会改造,这同时也是彰显“主义”、推广“主义”、践行“主义”的过程。需要说明的是,强调“主义”的重要性,不限于马克思主义者,非马克思主义者也很强调“主义”的重要性。无政府主义者梁玄冰以“两极”的笔名在《民风》上发表文章,对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章进行批驳,认为“研究问题,首先要根据一种主义”,如果“没有主义,如何会解决问题”呢,故而“主义”乃是必须的,因为“主义”本身是与“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不可分开的^③。

应该说,不仅像李大钊这样的思想家能够体认“主义”的社会改造意义,而且当时诸多的学生社团,亦能较好地体认“主义”与社会改造的关系。譬如,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就有着强烈的推广“主义”意识,并特别重视“主义”的地位及其与社会改造的关系,其发布的“通告”中说“黑暗的中国,何处不应该改造?腐败的教育,何处不应该改良?我们因事实上底限制,不能把我们底平民教育主义推广全国,这是我们极大的恨事!”^④又说“我们相信本团团员都是很热心的,必能将本团的主义推广到全国去。”^⑤故而,讲演团一方面要求其团员深入乡村开展演讲工作,在“主义”的“输出”方面努力,藉以“推广主义”;另一方面,就是要求团员在“主义”引导下更好地认识社会,将社会的情形“输入”自己的认知中,因而也就“希望各位都要把当地社会实状详细记录下来”,便于“作我们改造社会底参考”^⑥。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发布的这个“通告”,在社会改造的话语中尤为强调“主义”践行的重要性,颇能说明“主义”与“社会改造”的关系。

当然,当时也有人只是认为“主义”是以“生活”为前提的,对“主义”与“社会改造”关系没有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譬如,早期的利群书社在于创造“一个独立自给的共同生活”,尽管其中亦有成员“赞成急进的总解决,并常以流血流汗两主义自命”,但总体上认为,处于“这酝酿未成熟的时代”不宜于采取急进“主义”,故而主张“能独立生活才宣传主义就可,想把生活建设在主义上面恐怕不行。完美将生活解决了再去宣传主义,才能够永久绵密的去图发展。”^⑦这里,利群书社表现出比较显著的改良主义色彩,只是强调“生活就是我们应具的实力”,故而也就把“主义”放在“生活”之后,但此处亦可见在利群书社社员的视域中,“主义”乃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只是由于其坚持“独立自给的共同生活”理念,而使“主义”不处于优先的地位罢了。

在“社会改造”的话语体系下,“主义”在时间的延续中被青年人所认同。这大概是普遍的现象。

① 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第2卷第4号,1920年5月。

② 《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9~50页。

③ 两极《请教胡适之君》,《民风》第13号,1919年8月17日。

④ 《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182页。

⑤ 《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186页。

⑥ 《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183页。

⑦ 《际盛致业裕》,《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68~169页。

实际的情形是,青年人一旦确立其信仰、明确其“主义”后,就会在“社会变革”的实践中将坚守“主义”的理念继续下去,并在更大的范围使“主义”获得更大的认同。天津的觉悟社社员在五四运动之后的不久,尽管“星散中国南北各地及欧美洲”,但“大多数仍猛进不已”,不仅社员中“十分之七八仍是互通音信,彼此非常了解”,而且“有一部分对主义上已有同一的趋向”^①。在德国的周恩来在致国内社员的信中说“主义问题,我们差不多已归一致。现在再郑重声明一句,便是‘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理,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其余的也不必谈了,我们大都可以心会。”^②周恩来留德期间“对于主义的宣传甚为尽力”,从而扩大了“主义”的影响范围。

“五四”时代对“主义”的认知和解读,有着那个时代的显著特色。譬如,当时的思想界就有“主义”的广义与狭义的认识。通常所说的“主义”是在狭义上的,指的是内心的根本信仰;广义上的“主义”则泛指所操持的思想、主张和见解。平民教育讲演团所坚持的“平民教育主义”,其所谓“主义”就是这个社团的宗旨。1920年6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刊载的《平民教育讲演团通告》一文,就期待着能够将其所主张的“平民教育主义推广到全国”,并认为暑假是“我们推广主义唯一的好机会”,因而对于“所交接底人,如认为有输入吾们主义之必要时,不管他是人多人少,我们就要与他攀谈”^③。这里的所谓“主义”是在狭义上使用的,特指“平民教育主义”。又譬如,在崇尚“主义”的时代,亦有人提出“主义”不能走到“极端”。五四时期的社团,一般都承认“主义”的极端重要性及坚定“主义”信仰的必要性,但对于信仰“主义”是否会走到极端问题大致还很少触及。《向明》杂志在其发刊“宣言”中说“主义本是一种学说的结晶,用以解决人生的,而走到极端时,却是把人生抛到旁边而专顾主义。”^④这里所说“主义”走到“极端”的情况,大致是强调对于“主义”不能采取盲从的态度,要注意到使用“主义”的目的所在,不能“为主义而主义”。这是对“主义”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再譬如,有人提出了“主义”研究的比较视域,认为尽管都是“革命”,但中外有显著的不同。罗家伦将是否有“主义”视为辛亥革命与十月革命的不同之处。罗家伦认为,“主义”对于国民的思想有着决定的作用,中国国民的思想必须“从速受过一番革命的洗礼”,否则这所谓“民国的招牌”是保不稳的。他在1919年底说“我们认定中国现在政治社会的不良,就是人民的思想不曾变换。我总觉得中国辛亥革命与俄国革命有一个大不同的地方,就是:中国的革命是以金钱权位运动军队来的,而俄国的革命是以思想主义征服军队来的——其实不但是征服军队,并且征服一切平民。所以俄国革命愈革愈好,中国革命愈革愈坏。”^⑤上述例证,大致表明“五四”言说中的“主义”,不仅有着学理探讨的性质,而且更为显著的是,与中国的社会改造事业联系起来。

由此,在五四时期“主义”崛起的时代,“主义”亦成为社会上的常用语词,并成为那个时代的显著标识。由于“主义”主宰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而在当时也备受人们的注意。当时,在政治上非常流行的有“社会主义”、“孙文三民主义”、“民主主义”、“联省自治主义”、“好政府主义”、“革命的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义”、“民生主义”、“民权主义”、“合作主义”、“大革命主义”、“武力主义”、“尚武主义”,等等。据1923年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日的“民意测量”,其结果是信“社会主义”者为最多,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者其次。自然,这里的“所谓社会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及马克思国际共产主义……等而言”^⑥。尽管“社会

① 施以《我们的开张篇》,《觉邮》第1期,1923年4月5~6日。

② 《西欧的赤况(伍致小、三)》,《觉邮》第2期,1923年4月15日。

③ 《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182页。

④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下册),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462页。

⑤ 《罗家伦答张继》,《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89页。

⑥ 朱务善《本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日的“民意测量”》,《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239页。

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涵义不一,但很显然的是,“社会主义”在当时的社会上已经具有话语权势。

需要说明的是,在“主义”兴盛的“五四”时代,社会上对“主义”亦存在着某种宽容和理解。五四时代是思想解放的时代,也有不少刊物对于“主义”表现出相当大的宽容态度。譬如,谭平山等1920年春在上海创办的《政衡》就主张不要禁遏布尔什维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该刊发表的仙槎(何思源)《防止过激派》文章中,认为政府采用查禁书报的办法来禁止布尔什维主义乃是笨拙的,那样做“适足以表扬他们的宗旨,和为他招广告有甚么分别?”政府“若是想将来免见这个危险,唯有顺应世界潮流,于共和政体的底下,发挥平民社会的精神的一个办法”^①。又譬如,《新教育》是宣传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刊物,但表示其所主张的“新教育”不仅是“创造新时代之教育”,而且也是“包含一切新主义之教育”,认为只要是“有利益于人类社会之进化与幸福者,不问其属何种主义,无不采取”^②。再譬如,《民心》杂志在《宣言》上公开申明“本报虽旨在改良社会,然不偏取何种社会主义”^③,因而该刊上发表的文章既有赞同马克思主义,也有不赞同马克思主义的。该刊上赞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一方面批评国内惧怕“主义”的心理,另一方面也抨击国内不与俄结交的行为,指出:“浅识者徒以波党之主义侵入为惧,而不知外交提携与主义容纳为二事。姑无论波主义之能否在吾国骤然深中人心,而引起不幸之事变,即令其然,但使撤退防兵,停止军事行为,与新政府相机谈妥浹之条件,苟欲禁止波主义之出版物发行,或限制俄人入境,固可依然自若,或加厉焉,亦无害也。今为恐怖一种主义之故,而牵动外交方针,牺牲全局利益,非所以言国家大计也。”^④对于“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宽容的态度,这对于资产阶级性质的刊物来说确实是矛盾的,但也说明五四时代在思想解放的语境之下,新知识界还是有着比较宽容的态度。在思想自由的语境之下,也许是出于对“主义”的宽容,故而有不少刊物并不强求各位撰稿人思想的统一,既允许提倡这种“主义”,同时也允许提倡那种“主义”。费觉天创办的《评论之评论》刊物,对于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新村主义、杜威的实验主义、达尔文的学说等进行了评论,而其整体倾向则是主张和宣传社会主义的,并在该刊的1卷第3号及第4号开辟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争论问题”的专栏。该刊上有人赞同基尔特社会主义,认为它是改造中国社会的最好方法,说“基尔特社会主义注重增进社会全体的福祉,并使个人有自由发展其个性之余地”,因而“是人类理想中最为完备之一主义”^⑤;该刊也有人认为基尔特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其理由是中国目前处于“高压的武人专制之下”,又是“容纳激烈思潮的时代”,“急剧的政治变化,恐怕难免”,故而这种“缓和新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也只有俟诸异日”^⑥。该刊对于基尔特社会主义,既允许发表赞成的意见,同时也允许发表反对的意见,体现出思想自由的办刊理念,对“主义”的不同有着很大的宽容性。

二、“主义”与社团的行进方向

考察五四时期“主义”的崛起,还得联系当时所组织的众多社团,并具体地考察“主义”与社团的关系。如前所述,“主义”处在五四时期的“社会改造”话语体系之中,要进行社会改造就得需要“主义”的引领;但所谓的“社会改造”,又需要以社团建设为基础,亦即是通过组织社团来达到社会改造的目标。故而,五四时期“主义”的崛起,又与社团组织密切关联。

① 《防止过激派》,《政衡》第2号,1920年4月1日。

② 姜琦《何谓新教育》,《新教育》第1卷第4期,1919年5月。

③ 转引自《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下册),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524页。

④ 君柔《我国之对俄政策》,《民心》第1卷第8期。

⑤ 程振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3号,1921年6月20日。

⑥ 陈学池《基尔特社会主义(Guilds socialism)批评》,《评论之批评》第1卷第2号,1921年3月20日。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在“社会改造”的话语中,不仅积极地组织各种社团,而且也认识到“主义”对社团的重要性。新潮社的主要人物傅斯年,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就认识到“主义”对于社团发展的重要性。关于新潮社的方向,他说“至于新潮社的结合,是个学会的雏形。这学会是个读书会,将来进步,有些设备了,可以合伙研究几件事。最后的目的,是宣传一种主义。到这一层,算止境了。”^①这可见,在社团进入高级阶段,“主义”则是不可缺少的要件。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愚生,在1921年7月南京年会上说,少年中国学会“在最初组织时,原不求大家主义相同;自去年与其他团体接洽,他们都有一定主义,于是我们遂发生需要共同主义的要求。”^②毛泽东在创建新民学会中,高度重视“主义”对学会的指导地位,藉以求得学会成员在思想上的统一。新民学会于1921年1月1日开会讨论“主义”问题,毛泽东主张要“规定研究的对象,宜提出几种主义(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定期逐一加以研究”,认为这“较之随便泛泛看书,有益得多”。会员中,有不同意见毛泽东提出的专门研究“主义”的主张。如有的会员认为,不只是“要研究社会主义、哲学、科学、文学、美学……都要研究”;也有会员认为“社会主义、哲学、文学、政治、经济,皆有研究的必要”,因而也就“不赞成专研究主义”。毛泽东则强调,其他方面可以“让会友去自由研究”,学会“所特要研究”的乃是“会友所共同注意且觉为现在急需的”,故而“主张单研究主义,如社会主义、实验主义等”,并“主张暂作半年预算,研究五六个主义”^③。新民学会的这次会议争论是非常激烈的,由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入新民学会的谢觉哉,目睹了学会这次关于“主义”的论争,同时也认为“主义”对于学会是极为重要的。谢觉哉在1921年1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连日新民学会开会,关于主义争辩甚厉。余谓宇宙之大无所不容,进化之途且恒赖矛盾之主义互抗互厉。以狭义言,因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以广义言,无所谓是非也。但同一学会则以奉同一主义为宜。”^④这次会议对于“主义”的激烈争论,正说明了“主义”对于维系新民学会的重要性。

对于“主义”在社团组织中的地位,当时的知识分子亦有较为深刻的认知,尤为强调社团应该是信仰“主义”的社团。施存统在讨论北京工读互助团失败的教训时,回忆说“我们因此对于工读互助团抱有莫大的希望,希望将来的社会都变成工读互助团——就是成为一个工读互助团的社会。……我们那时所预定的步骤,大概第一步巩固团体的基础。巩固团体的基础,一种是独立的技能,一种是专门的学识。第二步扩张我们的团体,实行主义的宣传。第三步联络各处同志,结成一个团体,实行世界革命。我们这三个步骤,都要想在工读互助团里走的。第三步走到之日,就是工读互助的社会实现之时。”^⑤这里,施存统虽然将“主义”视为工读互助团的第二个步骤,但是看到了“主义”对于团体的重要性,只是还没有将“主义”放在社团核心的位置。北京工读互助团虽然失败了,施存统对于“主义”的认识有所进步,对其所认可的“主义”有了坚定的决心“我们试验共产失败,只是受经济的压迫,不能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缘故。这是无可如何的。我们并不因此怀疑共产主义。我们因此更信共产主义,晓得现在的社会的经济组织非根本改革不可。我说这话,是希望我们最敬爱的朋友,不要因为我们一时的失败就去怀疑神圣的主义。”^⑥施存统对于共产主义的认识虽然有诸多的问题,但是他对于“主义”则是信仰的,并且希望以“主义”来指导社会的“根本改革”。

正是因为“主义”在社团中处于思想引领性的地位,故而当时的社团常常因为“主义”问题而发生争论。社团中关于“主义”的争论,尤以少年中国学会最为激烈。少年中国学会乃是研究学问及

①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98页。

② 《南京大会纪略》,《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358页。

③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588~589页。

④ 《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608页。

⑤ 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424页。

⑥ 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436页。

改造社会的团体,有着创造“适合于二十世纪思潮之少年中国”的目标。但对于何种思潮适合于 20 世纪,少年中国学会成员的认识也是各不相同,“有以英美式民主主义之组织为适合于二十世纪者,亦有以俄国式社会主义之组织为适合于二十世纪者,更有以安其那式 Anarchism 之组织为适合于二十世纪者”^①。在少年中国学会 1919 年 1 月的吴淞同济学校召开的筹备会议上,曾讨论学会是否应有“主义”与“信仰”问题,但到会者一致不赞成统一会员的主义和信仰,其表决的议案云“思想宜极自由,主义亦不必一致,将来大家切实研究之后,有决定之必要时,再为讨论决定。”^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少年中国学会在创建之初,社团的思想受主要发起人之一的王光祈所左右。还在吴淞的筹备会议上,王光祈强调少年中国学会在“主义”问题上“是不能一致的,亦不能强同的”,甚至认为“所谓主义者,不过末节而已”^③。王光祈为什么不赞同少年中国学会要有“主义”呢?按照王光祈的解释,不是“先有主义,后有习惯”,恰恰相反,而是“须先有一种习惯,而且生活上有要求某种主义的必要,然后给他一个主义,始能运用自由”;而就少年中国学会而言,就是在培植“习惯”、做未来运用“主义”的“预备工夫”,故而学会现时也就不需要什么“主义”。王光祈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趋向,就是承认现在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无论在什么主义之下都是不成功的。若要现在的中国人能有应用各种主义的能力,必先使中国人的思想习惯非彻底的改革一番不可,非经过一番预备工夫不可。少年中国学会的目的,就是努力从事这种预备工夫。”^④李璜亦赞同王光祈关于社团不讲“主义”的主张,他在吴淞筹备会议的发言中就说,“所谓某某主义者,不过达吾人共同目的之一手段而已”,尽管“对于主义有决定之必要,但今日尚非其时也”^⑤。李璜即将去法国留学,临行前还发表《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文章,以“平民的智识”不高为由,阻扰“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对于学会的影响,藉以避免俄国式的“社会革命”在中国的发生。此文说“十九世纪马尔克斯(Karl Marx)主张的阶级战争,实行的手段有一种是万国工党同盟罢工,但因为罢工,每次都生出暴动,不知道累了多少平民。又如现在俄国的社会革命,以致彼此相杀,闹得无有人道了。这都因为平民的智识未足,一旦骤然给他许多主义,他不能充分了解,反转闹出岔子来了,惹得政治家、资本家来说社会主义的坏处。这并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不好,要怪社会学者不从根本上着手的弊端。要根本上着手,非增进平民的智识不可。……像这样做起来,或不致于再蹈一八四八年的覆辙与今日俄国社会革命现象了。”^⑥与李璜持相同主张的易家钺在 1919 年 3 月说,世界上最为流行的有美国的“民主主义”,亦可称之为“政治的民本主义”,也有俄国的“过激主义”,亦可称之为“社会的民本主义”,并且“这两样东西其势力足以支配全世界”;这“过激主义是主张从根本上推翻现在的社会,另造成一个庄严华美的世界”而以“现在的中国而论,尚在欧洲十八世纪时代,我们若提倡社会的民本主义,反为不合时宜,只好降格求这政治的民本主义罢了”^⑦。王光祈也认可易家钺的“政治的民本主义与社会的民本主义”观点“极确当”,并说“我们若提倡俄国式社会的民本主义,拿国家权力来干涉个人生活,实是一件不合民情的主张。”^⑧在王光祈影响下,少年中国学会的上海成员发表公告,认为“叙述他人之主义而见残,殊不值也”,即使学会有其“主义”也应该“无取张明旗帜,以招横祸”,并明确表示要“多研究‘学理’,少叙述‘主义’”^⑨。远在法国巴黎的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对于上海成员“多研究‘学理’,

① 《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 220 页。

② 《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 288 页。

③ 《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 288 页。

④ 王光祈《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 309~310 页。

⑤ 《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 287~288 页。

⑥ 李璜《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 289 页。

⑦ 《易家钺致慕韩、梦九》,《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 291~292 页。

⑧ 《王光祈致君左》,《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 294 页。

⑨ 《上海会员致北京会员》,《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 318~319 页。

少叙述‘主义’的声明表示严重不满。他们发来了《巴黎本会同人致京沪本会同人》的意见书,认为“主义”不仅是做事的根据,“无主义不能作事”,而且“主义”也是认知社会、改造社会的依据,而且还是维系社团的纽带,故而“所谓主义者,实系有学理上相当的根据,有将来具体的计划,并非求合于社会,实欲社会与之相合。属于主义以下之分子,主义即其共同点,即系集合团结的唯一原因。分子应为主义而牺牲,主义不应为分子而动摇。”^①该意见书还从“主义”与“学理”的关系,阐明学会恪守主义的极端必要性,指出“学理主义并非截然两事,所谓主义,实即学理之结论,学理即主义之原则。若主义而根据学理,则吾人决不可因恐人误会及社会黑暗遂隐忍不言。且据理最深、造福最大之主义,每每因一般人之难于了解,不遑深求,反多惊世骇俗或且蒙暴戾之反响。若因恐惊世骇俗或蒙反响之故,遂将主义不谭,则绝非研究学理之初意,亦非自觉觉人之本心。故主义但当问其是不是,不当限制其多少。学理之研究亦当切实有益于人生,不当与主义悬绝,徒尚空论。”又指出:“有一定主义,研究学术方切实。有切实的研究,方有主义正确明白之一日,然后人生方有光明之进步。”^②少年中国学会在欧洲留学的成员,坚持“主义”在学会中的地位,这应该说是学会中激进派的重要力量。除少年中国学会外,全国其他地方的社团也发生“主义”之争,则不过程度不等而已。譬如,江西改造社主要领导人袁玉冰^③,在其社团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当时,改造社内有人反感甚至厌恶谈“主义”,认为“忠实于某种主义的人”实际上是“某种主义的奴隶”。袁玉冰在1922年10月致改造社成员黄在璇的信中指出“中国社会没有时间来用渐进的手段,前面已经说过。马克司的共产主义是急进中的能够实现的主义,这是社会学家所公认的。只要看他主张非妥协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就很可以坚我们的信仰了。所以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候,只有马克司的共产主义配做我们的信仰者。”^④袁玉冰还在《新江西》上发表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不仅认定“马克司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并且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阶级斗争学说和劳农专政学说,而且向青年发出号召“我们不能没有主义的信仰,我们要为主义而奋斗,为主义而牺牲”,“学马克司做一个社会改造之实际运动的 Fighter”^⑤。袁玉冰是江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一。社团因为“主义”问题而发生论争,尽管争论的激烈程度有所不同,但发生争论这在当时大体上是属于常态。

五四时期的社团在“主义”之争中发生分化,这成为当时的“社会改造”中的一个显著的现象。因“主义”的不同而使社团发生分化乃是必然的,这在少年中国学会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会为南京大会时能够“准备提案起见”,于1921年6月17日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召开谈话会,邓中夏、黄日葵等出席,主要是就“本学会应否采用某种主义”进行讨论,但没有能就“主义”问题形成统一的意见。会议形成四种意见:一是主张“学会有采用一种主义的必要,而且不可不为社会主义”,这实际上关涉“本会能否为社会主义的团体”问题;二是认为“本学会不是无主义的,创造少年中国就是本学会的主义”,这个“少年中国”既不是“国家主义的少年中国”,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少年中国”,因而学会“不能以自己所能全然赞同的别人的主义认为自己的主义”;三是认为学会“不能采用一个主义,而且没有这必要”,最多只能“就一般主义中定一最低及最高限度”;四是认为学会既然在“学”,则“所有一切主义均在我们研究讨论之列”,故而也就不应该使学会“变成了空

① 《巴黎本会同人致京沪本会同人》,《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324页。

② 《巴黎本会同人致京沪本会同人》,《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320~321页。

③ 袁玉冰(1897~1927),又名孟冰、冰冰,江西省兴国县人,是江西传播马列主义先驱。“五四”运动后,发起组织进步团体“鄱阳湖社”,后改名为“改造社”,主编《新江西》杂志。1922年8月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1924年春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冬回国后任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地委宣传部主任、团地委书记等职。1927年任中共九江市委书记、中共赣西特委书记。因叛徒告密被捕,12月在南昌英勇就义。

④ 《袁玉冰复黄在璇》,《五四时期的社团》(三),第272页。

⑤ 袁玉冰《敬告青年》,《五四时期的社团》(三),第277~278页。

谈主义挂招牌的团体”。由于讨论中无法形成统一性的意见,会议“最后议决,此次在南京大会无论何种提案,只用会员名义,不用总会名义”^①。在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会之中,虽然一些成员“感觉有采用一种主义的必要,与沪宁同人见解颇有不同”,但是这次“谈话会”在事实上亦难以在“主义”问题上形成一致性意见,这实际上预示着学会可能会因为“主义”的严重分歧而发生分化的趋势。少年中国学会于1921年7月1日至4日在南京召开年会,“主义”的讨论最为激烈,这同时也是这次年会被关注的焦点。据参会的代表邵爽秋事后说,他在会上申明学会不必要有“主义”,结果是“大众不听,一定要定主义”,而且“他们吵了好久,终以所抱的主义不同,不能得同一之结论”^②。在这次年会上,主张“主义”的成员显然占据优势,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引领性作用。关于学会何以需要“主义”,邓中夏在发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学会须讲学、实行兼重。但为决定二者缓急先后,全会应有共同的目的以为标准,故必采取或创造一种主义,以为学会的主义。”又指出“学会以往的对社会无甚效力,都因无共同主义之故。必须规定了主义,大家求学、做事才不误入歧途;才便于分工互助;向外活动才旗帜显明,易结同志团体;所谓失节堕落,亦才有个标准,于人格的保险能真有效力。这都是有了共同主义的好处。”^③黄日葵则从“改造社会”的必要性和学会必须走向“政治活动”急迫性,说明需要“主义”的缘由“主义是时代的产物,今日为中国的改革,实觉有须一种主义的必要。而考学会所以发生规定一种主义的问题,一由受时代潮流影响,会员发生各种行为,以不明学会属何主义,故每向学会以外活动,大家不满足于这种现状;二由于会员事实上已无法避免政治活动,不能无一定主义以为活动的标准;三由会员社会上各种活动以所持主义各异,是非善恶各执一说,每引起误会。由这所以不可无共同的主义。”^④关于“主义”的性质及其产生路径,高君宇在发言中指出“人不可无一种主义,是无疑的。学会会员为创造少年中国便于分工互助,不可无一种主义,这亦是无疑的。……我以为主义不是宗教,是一种方法,是用他向各方面改造的方法,不限于政治经济方面。我不赞成先做各种事业,以求产生共同主义的话。因无共同主义,在先所做的事,尽有背道而驰的,无可以产生共同主义之理。故我信还是限定一期间,以研究主义,然后即规定一种主义的好。”^⑤刘仁静则从“科学精神”的角度阐发“主义”的必要性:指出“主义自然不是一成不变的,科学的精神,正是利用假设以去实验。实验的结果,每有将假设加以修正的。自然科学不因假设须修正遂不规定假设,社会科学亦然。且社会情况比之自然情况实较为不流动,故应规定一种主义,本无疑议。”^⑥此次会议,参会者23人,都对“主义”问题作了发言,最后的表决结果是“主张不要主义的六人,主张要主义的十七人”^⑦,这可见“主义”派在当时有着更多的支持者。南京年会后,少年中国学会还在《少年中国》月刊上发表有关“主义”的相关讨论,虽然还是主张“主义”与反对“主义”的两大对立阵营,但是因为“主义”派在当时占有话语权势,加之原来有些不主张“主义”的成员如恽代英等,此时亦趋步于“主义”的阵营,故而年会后的讨论也就有力地扩大了“主义”的影响。举一个例子:一个叫郑伯奇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没有能够参加南京年会,但当他得知“南京大会讨论最剧烈之点,听说是主义之争”后,立即写了一篇文章投给《少年中国》,强调学会不仅“要讲主义”,而且“要讲主义应从社会主义起码”,亦即起码以社会主义作为学会的“主义”;同时,还希望学会能够“对于既存的各种主义加以研究,并要以研究所得为最小规模的试验”。他并以

① 《北京总会方面六月十七日的谈话会》,《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347页。

② 《少年中国学会问题》,《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370~371页。

③ 《南京大会纪略》,《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354~355页。

④ 《南京大会纪略》,《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356页。

⑤ 《南京大会纪略》,《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357页。

⑥ 《南京大会纪略》,《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358页。

⑦ 《南京大会纪略》,《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360页。

“社会主义”来解读少年中国学会 指出“至少社会主义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的最合理的政治组织了。那么 我们的少年中国应是立足于社会主义的国家 我们少年中国学会自然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团体 而我们都是社会主义的信徒。”^①这可见 年会后《少年中国》月刊上的讨论 在某种意义上乃是年会的继续 并使“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影响至少在社团内得以不断延续。也有会员要求学会关于“主义”的讨论要继续下去 如杨钟健就希望学会“照从前调查会员终身志愿的法子 每人送一表” 调查三项内容: (1) 少年中国学会要不要主义? (2) 若是要主义 要什么主义? (3) 实行这主义的步骤。”^②杨钟健的这个关于继续讨论“主义”的建议 实际上是将要不要“主义”的讨论 转变为要怎样“主义”的讨论 并进而发展为怎样践行“主义”的讨论 这就有着从“坐而论道”进到“起而行之”的意味 因而极具有从“思想认知”层面转变为“具体行为”层面的象征性意义。也许正是因为少年中国学会不能实现“主义”的一致 邓中夏在南京年会后即在北京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社会主义研究会” 宣布该研究会对于“主义或该主义中之一观念详细述释” 并重点研究“马克思社会主义”中的“唯物史观”、“阶级战争”、“剩余价值”及“无产阶级专政”等内容 同时亦研究广义社会主义所涉及的相关内容 如“社会民主党”、“修正派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布尔扎维克”、“社会主义发达史”、“社会主义运动之现况”、“社会党与共产党”、“第三国际共产党”、“德谟克拉西”与社会主义”、“中国救亡与社会主义”、“世界改造与社会主义”等内容^③。这大致表明 作为当时规模最大的社团——少年中国学会 因为“主义”的分歧而出现了瓦解的趋势。

李大钊在当时的社团“主义”之争中有着非同寻常的表现 在五四时期的思想演进中起着引领的作用。李大钊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他同时也是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会中激进派的领袖 故而在五四时期的“主义”之争中发挥了领导作用 并对当时的社团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他鉴于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潮由“个人解放”转向“社会改造”之后的需要 认为加强“主义”对于社团的引领是不可缺少的 这对于“社会改造”也有着思想指导与方向引领的意义。在1920年8月16日北京陶然亭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会、天津的觉悟社、北京的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等五团体的茶话会上 李大钊代表少年中国学会致辞 提议各团体皆有标明“主义”之必要^④。于是 在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8月19日的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召开的茶话会上 李大钊在会上就“主义”问题向同人提出建议“本会同入已经两载之切实研究 对内对外似均应有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 盖主义不明 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 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也。”^⑤在少年中国学会中 李大钊属于思想上的激进派 不仅极端重视“主义”的价值 而且极力主张采用俄国式的布尔什维主义 这对当时学会的北京成员邓中夏等有着积极的引领作用。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会于1921年2月19日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召开常会 目的是为7月在南京召开的年会作准备。受李大钊培养和教育成长起来的邓中夏 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讨论主义问题”的议案 认为学会“创造‘少年中国’”的宗旨“太空泛了” 因而应该“选择一种‘主义’以充实之 庶乃精神贯注 成效可期”。这次北京常会决定 北京方面计划“尽一二月内先将各种主义精心研究 并一面邀请深知社会主义者到会讲演” 待“二三月后 由会员间开讨论会数次 稍稍决定采取之趋向 以备南京大会开会时提出”^⑥。李大钊关于“主义”的主张 不仅对于中国少年学会中的年轻一代如邓中夏、黄日葵、

① 《少年中国学会问题》,《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376页。

② 《杨钟健致会员诸同志》,《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415页。

③ 《少年中国学会社会主义研究会》,《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390~391页。

④ 《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327页。

⑤ 《在少年中国学会北京会员茶话会上的讲话》,《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267页。

⑥ 《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345页。

高君宇、刘仁静等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于其他进步社团中的成员亦发生很大的影响。

三、“主义”的本土化趋势

“主义”之争带来了五四时期社团的分化,并使得当时的中国社会在思想演进方面呈现激进化的态势,但在“主义”之争之中,亦有关于“主义”的“本土化”倾向,尽管这一倾向在当时有被“主义”的激进化趋向所掩盖的情况。此处所谓“主义”的“本土化”,是说“主义”的引进或运用时主张要适合中国具体的情形,反对不加变通而照搬照抄外来的“主义”,故而也就不希望对外来“主义”的过分崇拜、生吞活剥。就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历程来看,各种“主义”进入中国之后,皆有着“本土化”的情形,只是程度不得而已。换言之,五四时期的“主义”的“本土化”乃是现代中国思想中“本土化”的起点。在此,讨论一下“主义”在论争中所出现的“本土化”倾向,应该说也有学术意义。

五四时期的社团在“主义”的论争中,“主义”的“本土化”倾向应该说是比较显著的。譬如,1921年6月17日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会的“主义”讨论中,那种主张“创造少年中国就是本学会的主义”的,是不承认以社会主义为“主义”的,而是要求学会的“主义”必须适应“我们的社会环境”并“适合我们生活的进步的理想”,这其实也就有点“本土化”的念头,尽管这种念头是不自觉的、潜意识的;至于那种主张“一切主义均在我们研究讨论之列”的,总体来说也还是主张“主义”的,只不过不认可社会主义,而是认可“我们自己的主义——理想的少年中国”,这“我们自己的”一语多少暗含着“我为主人”的意思^①。又譬如,在1921年7月的南京年会上,北京的陈愚生是主张“主义”的,认为少年中国学会需要“共同主义”(尽管不是马克思主义),并希望“此共同主义必须自创,非可采已成的主义”^②。这里,既主张“主义”又不主张采取“已成的主义”,应该说也是有些“主义”的“自主意识”的,故而也就有点“本土化”的意思。再譬如,少年中国学会有一名叫汤腾汉^③的会员,到南京后因为生病而住院,没有能够参加1921年7月的南京年会。他后来致书少年中国学会,一方面主张学会要有“主义”,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不能抄袭现成的“主义”,而应该将各种“主义”统合地研究并与“社会的情形”相结合,形成一个具有特色的“少年中国主义”。他在信中说“主义是需要的。因为勿论要想做那一桩的事情,总要有一个目标方才容易着手进行。不然,那就像航海没有带着指南针一样。但是主义究竟要采用那一种的主义呢?许多的主义,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各的短处。适用于彼,而不适用于此;适用于此,而不适用于彼。所以在我个人看来,还是采集各种主义的精粹,再以我们据科学的方法、社会的情形、世界的趋势研究得来的加在内面,熔化成个‘少年中国主义’。”^④此时的汤腾汉,尽管尚未找到自己理想的“主义”,但对于“主义”的信念还是坚定的,故而他基于“主义”有着“各有长短”的认知,主张通过“采集各种主义的精粹”及具体研究藉以求得适合“少年中国”的“主义”,因而也就表现出比较强烈的“主义”本土化的理念。

“主义”的“本土化”既然是一种趋向性的力量,因而那些没有明示其“主义”的社团或个人,其实也是有着“主义”的“本土化”理念,只不过这种理念的强弱有所不同罢了。从学理上说,“主义”的“本土化”是以恪守其所信仰的“主义”为前提的,倘若思想上不主张“主义”,也就没有“主义”的

① 《北京总会方面六月十七日的谈话会》,《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346~347页。

② 《南京大会纪略》,《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358页。

③ 汤腾汉(1900~1988)福建省龙溪(今龙海市)人,印度尼西亚归侨。1917年回国后考入日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1918年考入南京工业专科学校机械系,1920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1922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29年获理科博士学位。1930年回国后曾任山东大学教授,华西协合大学理学院药系主任、教授,同济大学教授等职。1951年后,历任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研究所所长、副院长,总后勤部卫生部医学科技委员会委员,卫生部药典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

④ 《汤腾汉致学会诸同志》,《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418页。

“本土化”说法了;不过,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即言说者并不明确地表示其“主义”之所在,但在事实上也是有着“主义”的“本土化”理念的。譬如,改造社社员苏芬并不明示其所遵循的“主义”之所在,但他致改造社同人的信中,也说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本社出版的《新江西》杂志是改造社会的一个工厂,工厂里的货物能供给社会需求才好;换句话说,本杂志的取材决不可光谈理论不顾事实!我以为最好的就是社会调查,发见旧社会的毛病,然后加一改造。……例如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劳农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现在最时髦的杂志把这些主义谈得天花乱坠,其实他们考察了中国社会情形没有?我们决不可学了外国主义,就拿到中国来应用,须知长子衣矮子决不能穿的。劳农也好,无政府也好,只要适合社会情形就成了。”^①这段论述,虽然没有标明苏芬到底主张何种“主义”,但其关于选择“主义”需要“适合社会情形”而有所变通的想法,这在事实上也是比较隐晦地存在着的。又譬如,少年学会对于社团尽管并没有明示其政治上的“主义”之所在,但其言说的话语体系中,亦对当时研究新思潮的态度表示出赞赏的态度,认为由于“思想革新”的影响,“以前认为大逆不道,完全幻想的社会主义,都有人肯研究、肯提倡了”,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又提请人们注意,不是宣传新思潮就能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这样能解决的。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了解中国。要了解中国,纵的须明白中国的历史,横的须明白中国社会情形”^②。这大致可以说,当时有些社团尽管并不十分不明白地表明其“主义”(其实也是有“主义”的),但因为比较注重社会实际问题的探索和研究,也就多少有着“主义”的“本土化”倾向。

“主义”的“本土化”乃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中一个重要的标识,故而也是研习中国现代思想史及梳理中国现代思想演进脉络时所无法绕过的关键环节。从中国现代思想衍化历程来看,“主义”的“本土化”问题,最先是由李大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所倡导。但是,五四时期社团中关于“主义”的“本土化”相关论述,与李大钊所说的“主义”的“本土化”还是有所区别,因为这些社团所说的“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故而他们所说的“本土化”也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或“中国化”,而是在一般意义上指西方各种“主义”在中国运用中的某些变通或“本土化”,亦即是关于“主义”运用中的一般性的方法问题。尽管如此,“主义”的“本土化”在后“五四”时期作为一种倾向还是存在,因而在叙述“五四”思想衍化的理路上也是应该予以重视。

四、作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作为“主义”在五四时期起初只是“新思潮”中的一个流派,但在后“五四”时期则逐渐成为思想演进中的主流,并进而在中国社会上建立其话语权势。故而,考察五四时期“主义”的崛起问题,还是要将作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作为重要的分析文本。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是唯物史观。在五四运动之后,有些青年人创办的刊物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已经比较深刻,高度重视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譬如,上海的南洋公学(即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创办的《南洋》杂志,在1919年8月的文章中对于马克思主义就有这样的认识“自马克思社会主义盛倡以来,全球几为煽动,人人心目中皆有改革思想,视旧社会若恶魔罪藪焉,马氏主义所以能风行者,不在乎能应合社会人之心理,而在乎能道破社会之罪恶,其所抱主义,全在唯物史观之历史论与解释经济论。马氏以为资本家恃其资本,生产力日益增加,而工人赖资本家之工作机会,致愁苦日复无穷。阶级之争,所以谋推翻压制之资本家,而另工人自代

^① 《苏芬致改造社同人》,《五四时期的社团》(三),第266页。

^② 吾真《努力求个新路》,《少年》第15期,1921年3月1日。

之。”^①这里,不仅道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思想,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核心要义的认识是正确的,凸显了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地位。

当时思想界在确认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之中,进而将“社会革命”直接定位为“社会主义革命”。“社会革命”在五四时期是作为“社会根本解决的方法”而提出来的,如《闽星》上文章说“方今经济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已经彰明显著,社会革命的活动又复继长增高,且已逼入于实行”,于此就要“赶早研究社会根本解决的方法,培植劳动家自觉的本能方才有用”^②。应该说明的是,在五四时期的话语中,所谓“社会革命”在其内涵上虽然有不同的认知,但最终还是落在“社会主义革命”上。《光明》月报倡导社会主义思想,认为“以今日进化趋向及科学真理断定之,则舍‘社会主义’外真没有第二个较他为好”^③。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之所以是最好的办法,就在于其不仅主张“社会革命”,而且以“社会革命的运动”方法打破私有制度,来实现其社会主义理想。他们指出“社会革命的运动,是谋人类的共同幸福,是要打破私有制度之下的一切组织,使无产阶级的同胞由奴隶的地位一跃还他的主人的地位;换句话说,就是使生产者——即劳动者亦即无产阶级的人民——得支配经济和掌管一切政权特权。”^④“社会革命”涵义被指称为“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力,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的“社会改造”业已走上了激进化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对全国的影响,在1921年显然出现了历史性的飞跃,以下试以福州、山东和北京的代表性刊物作简要分析。福州的《自治》半月刊虽然在1920年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但该刊的主体思想在当时还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到1921年,山东创办的《新山东》虽然还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马克思主义确实改变了该刊物的导向。该刊主张政治组织上的“苏维埃”,如有篇文章这样说“现在建设的初步,就是大家起来一部分一部分的去组织‘苏维埃’。按苏维埃就是会议的意思。一城里有‘城苏维埃’,一村里有‘村苏维埃’。无论士农工商及一切职业联合之中都举出委员来,去到苏维埃出席,到那时就把这一些什么县长、道尹、省长、督军等长官去掉了。”^⑤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对于《新山东》的影响。1922年2月在北京创刊的《今日》杂志,负责人是胡鄂公,虽然该刊对于马克思主义有不少误解,但该刊差不多每期皆有关于马克思学说研究的文章,其他文章也差不多是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写成的。《今日》杂志上于1922年5月5日举行了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讲演大会,同时还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将《今日》第1卷第4号定为“马克思特号”,专门刊载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的文章。《今日》乃是当时较有影响的刊物,不仅刊载马克思著作的相关译文,为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贡献,而且走出了熊得山(1891~1919)、邝摩汉(1885~1932)、林可彝(1893~1928)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据胡鄂公撰写的《纪念熊得山先生》文章所说“民十社会主义思想,已随着苏联革命影响传播到中国。我和熊先生、邝摩汉等即悉心从事,一方研究劳农政府的实际设施,一方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真谛。那时我们就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熊先生早年所学的社会科学和日文,早已久置就荒,在那时才又刻苦努力起来。他晚年在学术上的贡献,主要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他和邝摩汉等八九人曾一度加入最初发起组织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十一年一月,我和熊先生、邝摩汉等组织共产主义同志会,出版各种刊物。熊先生所译的《哥达纲领批评》和《国际劳动同盟的历史》,都是有关劳动运动的重要文献,

① 蔼人《社会改革与劳工酬报》,《南洋》第4期,1919年8月15日。

② 芝山《劳资会议是什么东西》,《闽星》第2卷第2号,1920年1月5日。

③ 耘公《光明运动的前途》,《光明》第1卷第1号,1921年12月1日。

④ 惠僧《社会革命与韩国独立》,《光明》第1卷第1号,1921年12月1日。

⑤ 滕耀宗《新山东和旧山东》,《新山东》第1号,1921年7月。

而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那一权威著作,也是由他首先介绍到中国来。十一年秋天,瞿秋白从苏联回国。经他和刘子通翰旋介绍,我们都加入CP,把共产主义同志会解散,但不久我们又和CP的组织关系断绝了。”^①总体来看,《今日》是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该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还有很大的不足。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社会改造”成为年轻一代的共识。1923年1月创刊的《明日》,虽然认为他们“对于马克思的研究,确是很幼稚”,但公开地表示该刊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申明“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实在是改造社会底良剂,所以我们打算本着马克思底精神来解决社会问题”^②。上述例证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自“五四”在中国传播以后,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可谓与日俱增。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力,也使得那些一贯主张缓进地进行“社会改造”的刊物,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阶级理论的深刻影响。阶级的观点在五四时期被不少人所认识,故而在言说中自觉不自觉地表露出阶级的观念。在广州于1919年下半年创办的《民风》周刊,虽然主要负责人是无政府主义者梁玄冰(在《民风》上以“两极”的笔名发表文章)、区声白等,但该刊发表的不少文章很显然地受到阶级观点的影响,虽然这些文章的作者不一定就主张马克思主义的那种“阶级斗争”。如该刊上1919年8月发表的《“长衫”应届末日》文章,以“阶级”的观点考察社会生活,认为“长衫”乃是统治阶级的标识,提出“弃长衫用短衫”的主张,指出“长衫最大的罪恶,深藏在骨子里头,不知不觉中,造成社会阶级的观念。穿起来便是绅士、是读书人、是大人老爷少爷、是‘劳心者治人’的好宝贝、是‘坐不垂堂’的好物儿、是东方的Gentleman。”^③一般说来,当时主张改良社会的人,大都不触及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只是试图在既有的制度架构中实现点点滴滴的改良,但也不尽然。五四时期,主张和平地改造社会的人,也有认识到制度变革的极端重要性。譬如,福建省立第二师范创办的《自治》半月刊,一方面主张通过人人自治的办法来改造社会,但在很大程度上也认识到社会制度的改造具有根本性,甚至还以“治者阶级”与“被治者阶级”的范畴来解剖当时的社会,并主张打破“阶级制度”。如该刊发表的“宣言”说“世界上所以有不平等不自由底事情,无非是为着有治者和被治者底阶级。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这治者和被治者底阶级?无非是因于一部分人放弃他自治底责任,其他一部分底人就从而代庖了。……我们要打破这阶级制度,达到自由平等底地位,不能不把自觉心从自治方面做起,不然凭你底自觉心怎样大,天天自由平等大声高呼去,也是不济事的。”^④这里,虽然把自治作为“社会改造”的手段,在思想认识上隶属于缓进派阵营,但对于社会改造对象的认识上,显然也受到阶级理论的某些影响,故而在话语系统上也就出现了“阶级制度”、“治者阶级”、“被治者阶级”等范畴。事实上,《自治》的一些作者也确实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如该刊发表《我的觉悟》的作者,不仅依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来分析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而且也认识到“经济革命”的重要性,指出“因为经济不平等,所以有贫富的分别。资本家的子呵、孙呵一代代都是资本家,那工人的子呵、孙呵一代代都做工人。但是资本家这种资本从哪里来呢?不外剥取工人的‘剩余价值’得来的。因此资本家一天富了一天,工人一天做了一天只能够维持生活而已,终是没有宽裕的日子。他的子和孙怎么不再去做穷苦的工人呢?所以社会上经济自然跑到资本家的手里去。……要是要除了这种弊害,非是工人困苦到极了,倡起经济革命不能成功。”^⑤《自治》虽远在南方的福州,但福州的青年学生至少在1920年抑或在这之前,即已经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并深受其影

① 胡鄂公《纪念熊得山先生》,《申报》1941年2月10日。

②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下册),第460页。

③ 香游《“长衫”应届末日》,《民风》第13号,1919年8月17日。

④ 赖汝《宣言》,《自治》第1期,1920年6月1日。

⑤ 林廷辉《我的觉悟》,《自治》第4期,1920年11月1日。

响。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虽然并没有被有些社团或杂志所接受,但这些社团或杂志受到阶级观点的影响也是很显然的事实。笔者的看法是,五四时期的一些并不是主张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阶级观点的影响,这大致能够说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及阶级斗争理论有着很强的影响力与渗透力。

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生重要影响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社会上阶级意识的显著增长。在五四时期的期刊中,业已出现“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话语,并且青年学生已经认识到社会中有着“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严重对立。1923年4月创刊的《女星》倡导“革命思想”,指出“凡稍有革命思想的人们,必都知道要援助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劳动者供给人类的衣食、住,反被人摧残、侮辱,谁都应该明白这是不平等的事情。”^①在五四时期的社会话语中,“被压迫者”是指劳动阶级,“压迫者”一般是指“资本家阶级”,但在中国的状况下,这“压迫者”还包括“世界资本主义”。《新民意报副刊》中有篇《本刊今后的趋向和任务》文章说“由机械的发明,造就了资本和劳动阶级。掌握全部生产的劳动者,反被压迫于资本家的底下,这是怎样的不平而可怜呵!尤其是中国的劳动者,一面受国内资本家的压迫,同时又受世界资本主义的侵掠,以致一天做了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其收入还得不到维持一人的生活,这是何等的残酷呵!”^②1920年6月1日创刊的《自治半月刊》尽管对于社会改造持改良主义的态度,但其发刊“宣言”亦表现出阶级的意识“世界上所以有不平等不自由底事情,无非是为着有治者和被治者底阶级,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这治者和被治者底阶级,无非是因为一部分人放弃他自治底责任,其他一部分底人,就从而庖代了。”^③这里,将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形成归于“一部分人放弃他自治底责任”固然不正确,但看到社会上存在着“治者阶级”和“被治者阶级”的现状。以上例证大致可以说明,迟至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虽然不一定信奉马克思主义,但阶级意识已经有着显著的增长,看到了社会中阶级压迫的严峻现实。

“主义”的崛起乃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基本事实,但这种事实乃是建立在五四运动所建筑的“社会改造”时代上,并与当时兴起的众多社团及其期刊形成内在的逻辑关联。因而,随着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活动的行进,随着社团的分化和“主义”的“本土化”趋向,能够适应中国“社会改造”的“主义”逐渐成为思想的主流,并在当时的思想界建立其话语权势。这样看,要比较全面地理解“主义”崛起这个事实,必须立足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并将这种理解切实地置于当时的“社会改造”的话语体系之中,如此才可能透视其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基本内涵,以及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这两者到底是如何奠定在历史衍化的实践逻辑的基础上。

[本文作者 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杭州 311121]

[责任编辑:王昌]

①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下册),第464页。

② 凌霄《本刊今后的趋向和任务》,《新民意报副刊》第8册,1923年8月1日。

③ 赖汝梅《自治半月刊宣言》(1920年6月1日),《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下册),第479页。